

烏盟人民剿匪記

第九輯



0506



烏盟人民剿匪記

烏力計題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审 阅：乌力计 莫德力图

满都麦 蔡新成

责任编辑：蔡新成

封面题字：乌力计

乌兰察布文史资料 第九辑

编 辑：乌盟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封面印刷：丰 镇 市 印 刷 厂

内文印刷：丰 镇 市 印 刷 厂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鑒往以知來
溫故而知新

雲志成



一九九二年冬

以史为镜
教育后人

傅罗布青



一九九三·九·二五

剿匪反霸
國泰民安

宋广文

一九九二、十二、一

前 言

文史资料依其自身的特点，将其工作中所抢救征集编撰的内容，划分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社会、教育、民族、宗教、风物等若干类别，其中社会史料则以涉及面广、内容繁杂而又有别于其他史料。我们从大量的社会史料中选编了乌盟人民剿匪记专辑，奉献给广大读者，旨在以史为镜，启迪后人。

从清末民初到新中国诞生前的数十年间，在乌兰察布大地，阶级斗争，外族侵略，军伐混战，兵变迭起，自然灾害，土匪蹂躏，社会百态纷呈，可谓近代史上旧中国社会动荡不安、人民屡遭涂炭，各族群众，特别是广大贫苦农牧民置身于天灾人祸带来的水深火热中痛苦挣扎的一个缩影。

本辑重点选编了反映本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初，绥西、绥南、绥东及乌兰察布各地土匪横行肆虐，兵匪勾结，旧政权腐朽无能，人民群众受害遭殃的悲残史实。旧中国军政警宪虽年年代代都叫喊惩盗剿匪，但始终没能奏效，匪患从未彻底绝灭过。只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崭新的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采取了：党动员，全民动手，发动群众，依靠群众，走群众路线的正确剿匪路线，和政治瓦解、军事追剿相结合的方针，以及实施“首恶者必办，协从者不问，立功者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等一系列路线、方针和政策，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彻底剿灭了旧社会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匪患，并夺得了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全胜。不仅为巩固崭新的人民民主政权，保障革命胜利成果乃至开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奠定了牢固的社会基础，而且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发自内心的拥戴和赞誉，同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和赞许。

乌兰察布地处祖国北部边疆，旧社会这里地广人稀，交通不便，社会人文地理特定的环境条件成为土匪盘踞出没祸害隐匿的地段。新中国诞生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乌盟各族人民，积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奋起与土匪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在剿匪镇压反革命运动中，涌现出许多剿匪英雄，创下许多与土匪反革命分子搏斗的业绩。尽管这方面的“三亲”史料并未全都也不可能全部征集到手，但就现有这方面的内容，足以反映其当时的史实概貌，对于研究这段历史，并以史为鉴教育后代，提供有价值的参考资料。

同时，出版本辑史料，特别是追忆乌盟解放前土匪肆虐骚扰的悲残景象，也无情地揭露了旧社会旧政权的腐朽顽症，使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同志认识旧社会的黑暗与腐朽。从而激发起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强烈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投身四化建设的高度热情，促进祖国统一和四化大业的进程。

本辑所编选内容、时间、范围以及编辑水平有限，作为地区社会史料专辑尚属首次，疏漏之处，在所难免，企盼读者指正。

编 者

一九九二年十一月

目 录

前言

漫话剿匪..... (1)

关于兴和剿匪斗争的回忆..... (5)

绥东剿匪纪实..... (14)

鄂友三为匪在武川..... (34)

苏美龙打七台..... (43)

绥东解放区一九四九年剿匪记事..... (46)

解放初期绥南剿匪记..... (54)

大青山支队剿匪斗争..... (60)

商都县解放前后的匪患和我党我军剿匪斗争..... (64)

河套匪踪..... (72)

——绥远地区土匪概略

匪患不断的缘由..... (89)

——塞北匪患源探

郑殿清匪邦的覆灭..... (99)

尖嘴猴腮杆子头 祸害骚扰五省区..... (109)

——杨猴小匪邦在塞北的罪恶

凉城县园子沟瓦解土匪纪实·····	(130)
智擒顽匪张廷芝·····	(133)
剿匪英雄——王根生·····	(137)
兴和土匪探·····	(139)
匪首录·····	(147)
卢占奎·····	(147)
鄂友三·····	(155)
高七子·····	(161)
苏美龙·····	(166)
王兰根·····	(170)
张老二 金狗娃·····	(172)
郭连生·····	(175)
王毛仁·····	(178)
郝游龙·····	(180)
周喜顺·····	(183)
李三角·····	(187)
徐 喜·····	(190)
郭长青·····	(194)
赵有禄·····	(198)
杨万贞·····	(202)
土匪暗语与忌讳·····	(207)

漫 话 剿 匪

蔡新城

土匪，也称强盗，响马，贼寇，如海盗、倭寇等。系指以抢劫为生、残害人民或一贯窝藏盗匪、坐地分赃的分子，也泛指其结帮团伙。

土匪，作为人类社会历史进程中，在一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产生、发展、衰落、消亡的社会现象，我国起始于何时，不得其详，至今尚无专门具体考证，也未见过专记。但见于历史古籍记述者，似可认定，在原始公社制度的社会是没有土匪的。据礼记礼运篇讲禹以前的社会情况时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尊重）能（酋长公选），讲信修睦（和平）。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养老），壮有所用（工作），幼有所长（抚育），鰥（老男无妻）、寡（老女无夫）、孤（幼儿无父）、独（老人无子）、废疾（残废）者皆有所养。男有分（职业），女有归（婚姻不失时）。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生产品共同所有）。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各尽所能）。是故谋闭而不兴（不欺诈争利），盗窃乱贼而不作（不抢劫掠夺），故外户而不闭（没有私有财产，不用关门闭户），是谓大同。”照礼记礼运篇所说，禹以前的社会是财产公有，没有剥削、没有阶级的大同社会。禹以后逐步形成财产私有的阶级社会。但禹不曾废除“禅让”制度，是大同时代最后的大酋长。小康时代应从启开始。礼运篇说：“今大道既隐（原始公社制

度解体），天下为家（变公有为私有），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己（财产私有），大人世及以为礼（子孙继位，认为当然），城廓沟池以为固（保护财产），礼义以为纪（制定礼教和法律），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阶级制度），以立田里（划分疆界，土地私有），以贤勇知（养武人谋士作爪牙），以功为己（谋取个人私利），故谋用是作而兵由此起（争夺不可避免），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统治阶级的圣人）。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以著其义，以考其信，著有过，刑仁讲让，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势者去，众以为殃，是谓小康”。

可见争夺、偷盗、劫掠财物的行为是从私有制的小康社会开始的，并且随阶级社会、剥削制度和私有财产的发展由最初奴隶制社会，以抢劫奴隶为主，发展到以抢劫财物为主。并且随着社会发展而愈演愈烈，《左传·文公十八年》记载：“其人，盗贼也；其器则奸兆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记载：“盗贼公行，而天厉不戒。”《荀子·正论》中说：“盗不窃，贼不刺。”杨京注：“盗贼通名，分而言之，则私窃为之盗，劫杀为之贼。”后来又逐步演变为劫杀为盗，私窃为贼。至于拉帮结伙，拉杆子肆意骚扰、侵犯掠夺等，被不同地区不同时代称之为强盗、响马、土匪、贼寇、海盗、倭寇等。有的甚至超越地域、国境，抢劫掠夺、骚扰作乱，远远超出了最初土匪行径本意，为匪的性质发生错综复杂的变化。

土匪横行暴虐，对历代社会各方面都有着严重的危害性。综观历代封建王朝（包括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都曾把清剿匪患作为整顿社会秩序、巩固其封建统治的重要内容和措施，颁刑立律，严加惩治。但是，没有一个朝代能够真正地彻底剿灭匪患。其根本原因在于，封建社会制度本身是一种阶级压迫、残酷剥削的私有制度，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互相倾轧，弱肉强食的孽海。尽管剿

匪有律有法，但往往只是统治者为安定民心而装装门面，哄哄百姓而已。实际上有很多达官贵人、官僚政客、封建地主士绅、财主黑社会势力道会帮派团伙，直至官兵等，与土匪头目，暗中勾结，互相庇护，兵匪不分，互相利用，狼狈为奸，匪患难绝。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不仅彻底摧垮长期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而且在建立了崭新的人民民主政权的新中国不久，就把剿灭土匪镇压反革命同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并称为建国初期的三大运动，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民除害，很快取得了彻底胜利。

当时国民党反动派败逃台湾后，在大陆上遗留下一大批反革命分子。他们并不甘心于蒋家王朝的失败，继续进行种种破坏、捣乱活动。特别是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误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蒋介石“反攻大陆”时机已到，反革命气焰更加嚣张。他们破坏工厂、铁路、烧毁仓库、民房，抢劫粮食、财物，散布谣言，蛊惑人心，以至组织骚乱，袭击、围攻我基层人民政权，残杀革命干部和群众中的积极分子。1950年广大新解放区，就有近四万名干部和群众被反革命分子杀害。其中仅广西就达七千多人。针对这种情况，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坚决纠正“宽大无边”的偏向，全面贯彻“首恶必办，协从不问，立功受奖”的“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首要分子，实行坚决镇压。从12月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张旗鼓地开展了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并明确指出这次运动打击的重点是土匪（特别是匪首、惯匪）、特务、恶霸、反动会道门头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分子。运动采取群众路线的方法，在党委领导下，实行全党动手、全民动员、使公安、司法机关、武装部门同广大群众相结合，并且吸收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参加。人民群众认识并掌握了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后，主动积极自觉地

起来检举揭发土匪、反革命分子。致使土匪反革命分子犹如网中鱼、缸中鳖、秃顶头上的虱子，无藏身之地。运动掀起高潮以后，1951年2月，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使镇压反革命斗争有了法律武器和量刑标准。当镇压反革命运动在全国形成高潮以后，1951年5月，中共中央又及时地决定让各级党委、政府要集中力量处理积案。在处理中，强调要注重调查研究，重证据而不轻信口供，反对草率从事，反对逼供信，特别强调指出要着重打击那些罪大恶极、为人民群众十分痛恨的反革命分子，对罪行较轻、愿意悔改的反革命分子采取宽大的方针。全国规模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到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镇压反革命运动的胜利，扫除了国民党反动派遗留在大陆上的反革命残余势力。曾经猖獗一时的匪祸，包括旧中国历代政府都未能肃清的湘西、广西、黄河后套的土匪，以及许多城市的黑社会势力，都被基本上肃清。这使我国社会秩序、基层人民政权获得前所未有的巩固、安定，有力地支持配合了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斗争的胜利完成。在取缔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卖淫嫖娼、贩毒吸毒、聚众赌博等各种丑恶现象的斗争中，一方面发动群众有力地打击、制裁借此谋利的制毒、贩毒者和赌头赌棍；一方面广泛进行宣传教育，提高群众觉悟，让吸毒、嗜毒者自觉地戒毒、戒赌。彻底扫除恶霸坏人赖以生存、藏污纳垢的窝点。经过两、三年的努力，这些在旧中国社会屡禁不止，西方国家也被视为不治之症的“社会病害”，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居然都被完全禁绝。这不仅使广大中国人民无不欢欣鼓舞，奋力投入恢复、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伟大事业，而且引起全世界的惊奇和赞许。

关于兴和剿匪斗争的回忆

姚玉光

解放初期，剿灭土匪，既是巩固基层政权、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中心任务，也是解放区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

兴和县地处察哈尔省、绥远省、山西省的交界三角地带，历史上就是土匪拉杆结伙，频繁出没、啸聚骚扰的非常之地，国民党统治时期，夜猫张（承德）、王天存、花公鸡、苏美龙等都是能聚集匪徒千人以上的头目，他们骚扰在兴和、察北地带。至于小股“地蹦子”，“棒手”等为非作歹的土匪孬人就更多了。据当时投诚反正的土匪武赖虎说，民国三十年前后，活动在察北、绥东一带的拜把子兄弟匪首就有七十多人。

傅作义当了绥远省主席后，曾派董其武带一个团的兵力常驻兴和进行匪剿，但始终也没有把兴和境内的土匪剿灭掉。一次傅作义去北京，董其武亲自负责警戒，从黛青山到柴沟堡这条公路两侧都有重兵岗哨。当傅将军从北京乘小轿车回来时，走到兴和县境内的台基庙附近，竟遭到土匪袭击，土匪猖狂程度可想而知。

盛怒之下，董其武血洗了黛青山下两个村庄，其中有多少土匪不得而知。但众所周知的是，董其武将军在兴和县认了两个义父，一个是兴和县白家营子恶霸地主、土匪头子张茂，另一个是三瑞里乡土匪头子、地主恶霸刘老四。

日寇侵华后，也大肆剿匪，同样没把兴和境内的土匪剿灭掉。我问武赖虎（兴和人称他武连长）：“你从国民党时代起就拉杆子转山头，经过两个朝代，为什么没把你们消灭掉？”他说，“国民党、日本鬼子的讨伐队，大部分和我们有交往有联系有交情。他们生活困难，没有洋烟（鸦片）抽，我们抢上地主老财的，还得接济他们。我们没有枪枝弹药，他们以讨伐土匪为名，多报冒领出来给我们送些枪枝弹药。日本鬼子占领时期的讨伐队，比国民党讨伐队厉害，但他们收编一些转山杆子头参加的讨伐队，也不是真正地讨伐我们。如果日本鬼子出动讨伐，就比较认真，发现这种情况，我们有时就避其锋芒，见机行事啦。”实际上在旧社会是官匪勾结，兵匪难分。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们的军队到兴和后，国民党的保安队、伪县政府人员和一些地主武装，全都上山当了土匪。当时在兴和境内骚扰的土匪，数上数的有邵德功、二阎王、赵德功、苏二小、郭全福、侯佃林、吴德功、郭连生、孙万宝等匪伙。大股的地主武装邢云带有120多人，县保安队有60多人，与兴和接壤的尚义县还驻有国民党骑兵十七旅。

解放战争时期，兴和县南山是天（镇）阳（高）怀（安）游击根据地，当时苏文波、高昆、张英等同志所带队伍都在南山一带活动。我们到兴和县后，他们住进白家营子村，建立了区政府。其余地区因为土匪骚扰猖獗，还不能建立基层政权，只能派武装工作组往来工作。十月份，县级机关驻到县城后，派到台基庙的工作组10多人，被国民党骑兵十七旅捉走了。其中区长李福民等三同志被敌人带到尚义县城南壕堑，用铡刀铡死，李福民同志是山西省灵邱县艮厂村煤窑工人，一九三八年参加革命，就义时才30多岁。

兴和县人民群众，深受匪患灾难已久，消灭这些土匪和地主武装，早已是广大人民群众盼望已久的共同心愿，也是当时摆在

我党政军民面前的一项艰巨而紧迫的任务。不剿灭土匪，残余地主武装，其他一切工作，都无法进行。时任晋冀军区司令员的王平同志，经过大量的社会调查、研究分析，知道那时土匪很多，我们每解放一个地方后，能留下来的力量又很有限的形势，指出：“剿匪工作要军事剿灭与政治瓦解相结合进行。”

王平司令员离开张皋的时候，将阳高县大队120来人留在兴和县，绥蒙区党委又派来了侯作贵同志任县委书记，田恩民同志任县大队教导员，又带来20多人。新兵多数战斗力不强，还有一个特殊情况，土匪多是骑兵，我们的同志却靠两条腿走路，很难适应实际需要。你一打他们就逃跑了，真是有点望尘莫及。要组建骑兵，当时枪马比较容易解决，而善于骑马打仗追剿敌人的战士非常难找，就地招收，我们不了解社会情况，怕混进来土匪，不敢大量吸收，“口里”人多数都不善于骑马，甚至不愿意当骑兵。当时，我的通讯员韩玉，是山西省繁峙县人，因不会管理马子，就不愿意当通讯员。有一次，我们在黛青山下的皂火口村开群众会，我告诉他骑马，把巩肚上紧，不要远离我。会没有开完，哨兵跑来报告，说在台基庙附近发现有骑兵。我结束了讲话，将马牵过来上了马。韩玉一上马，因巩肚没抽紧，鞍子转到马肚底下，将他摔下马来，马缰绳也撒手了。他抱着枪坐在地上说：“政委，我不走了。”在这紧要关头，范瑞同志连马也没下，将韩玉的马捉住，上紧了巩肚，武赖虎一只手捉住小韩的脖领子，将他一把拉上了马，当敌人的骑兵赶来时，我们二十多人的队伍，早已上了黛青山。

围剿土匪斗争任务的形势和经验教训，坚定了县委组建骑兵的决心。当时从县大队抽调了一名指导员负责组建工作。说来也巧，正在我们组建骑兵时，在大同窑子村一带收住国民党骑兵旅跑出来的十多匹骑马，都是好马，鞍子也都齐备。县委同志和战士们都十分高兴，从县大队又抽出一名党员班长，专门负责管理